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第二种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二辑

—— (1895—1914) ——

上册

汪敬虞 /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等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参考资料。《丛刊》包括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工业史料、农业史料、手工业史料、对外贸易史料、外债史料、铁路史料和航运史料,凡八种,二十六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 严中平等编.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03-047082-9

I. ①中… II. ①严… III. ①中国经济史-近代-参考资料 IV. ①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1644号

责任编辑: 李春伶 / 责任校对: 董晓舒 刘蒙伟 王 媛等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联系电话: 010-6400 5207

电子邮箱: lichunl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3月第一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88 3/4

字数: 1 316 000

定价: 6800.00元(共26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影印书除外)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

编者 严中平 孙毓棠 汪敬虞
李文治 章有义 彭泽益
姚贤镐 徐义生 宓汝成
聂宝璋 朱荫贵 等

科学出版社

北京

编者简介



汪敬虞（1917—2012），湖北圻春人。中国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先为研究生，后为助理研究员。在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书中，承担工业部分的研究和撰写。1949年以后，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 1895—1914》、《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唐廷枢研究》、《汪敬虞集》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等近十部著作。这些研究深入探索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途径和过程，全面评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诠释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这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出版后，先后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再版前言

王方中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严中平先生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这套《丛刊》包括八种资料：

第一种：《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编，1955年出版。

第二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一辑 1840—1895》，孙毓棠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二辑 1895—1914》，汪敬虞编，1957年出版。

第三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一辑 1840—1911》，李文治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二辑 1912—1927》，章有义编，1957年出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三辑 1927—1937》，章有义编，1957年出版。

第四种：《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共四卷，彭泽益编，分别出版于1957、1958年，1962年刊出修订版。

第五种：《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1840—1895》，姚贤镐编，1962年出版。

第六种：《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1853—1927》，徐义生编，1962年出版。

第七种：《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宓汝成编，1963年出版；《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 1912—1949》，宓汝成编，2002年出版。后者未列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第八种：《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一辑 1840—1895》，聂宝璋编，1983年出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二辑 1895—1927》，聂宝璋、朱荫贵编，2002年出版。

这套《丛刊》的编辑出版首先是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服务的。为什么要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从严中平先生一段本来是用来勉励青年学者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为了反击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的歪曲，捍卫祖国的尊严。他说：“新中国的胜利，引起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极大兴趣。

1949年以来，外国所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远比我们的多得多。其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歪曲历史真相的。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当然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6）严先生还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了一百多年，难道就没有任何经济规律可说吗？马克思主义所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在这个社会里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这些问题，当然是我们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者所要探讨的。”“我们对我们这个社会所由以出发的国情还摸得不够透。”（前引书，第31、32页）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也是为了探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摸透我们这个社会所由以出发的国情。

严先生这样概括他们小组在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时的工作程序：“回顾从1953年到今天这三十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参考的话，那只有一条，即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书。”（前引书，第20页）收集资料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基础，不能搞无米之炊。

关于小组收集、编辑资料的过程，严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们小组是1953年受命搞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的。……经济史资料工作是个体劳动，我们的办法是由一位，至多两位负责一个经济部门史资料的收集和编辑工作，有那么几个人，就编那么几个部门的资料。经过两三年至四五年的工作，先后编出一批部门经济史资料的定稿或初稿，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在闹资料饥荒，为适应那种迫切需要，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只好一面学习经典理论，一面收集资料。我们理论水平之低是不需多说的，就是在资料方面，我们也只查看了某些著作和报刊，搜罗得不够广泛，至于档案，基本上没有利用。这都是我们所出资料的很大局限性。不过，我们毕竟编出那么几本资料汇编，质量虽不算高，力气却花了不少。这些资料汇编对当时的资料饥荒是起过一定解救作用的，对于我们自己，也是进行研究的一项基本功。”严先生随即补充说：“我希望青年充分注意这项基本功，对人对自己，这都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一个工作程序，轻视、厌烦，都是不行的。”（前引书，第18—19页）

记得刘大年先生曾经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严先生领导的近代经济史编写组这种坚持从史料出发、扎扎实实的作风。刘先生认为，这套资料的编辑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一次较大规模搜集、整理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结果。正如严先生所说，这套书对当时的资料饥荒起了“解救作用”。我是1956年前后开始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当时能够看到的经济史书籍极其有限。这套资料，特别是其中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以及严中平先生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吴承明先生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就是我的入门读物。相信通过读这些书跨入中国近代经济史学门坎的人还有不少。

从这套资料开始出版到现在已过去了六十年。在这六十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版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如，《丛刊》里摘抄得很多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文集早已整理出版。1957年以陈翰笙先生为首成立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从海关档案中编译了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共10辑）。最近我才知道《中国海关密档》早在1995年就已由中华书局全部出版了。还有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至少十几部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这许许多多近代经济史资料，有的是将原有资料完整地重印出来，如前两者；有的和《丛刊》一样，是从浩繁的原始资料中择要编选而成，如后者。无论哪种情况，都证明由《丛刊》所开辟的重视资料、从资料出发的道路是正确的。《丛刊》诸书所搜集、整理的资料是海量的，范围极其广泛，这些资料原来的出处（报刊、著作、地方志、档案、海关资料、官方文献等）现在能重版的只是极少数。正因为如此，《丛刊》中的资料还是经常被引用。编者在编辑资料时的思路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至于由编者经过细致研究，加工得出的一些统计数字就更加宝贵了。因此，我认为科学出版社将《丛刊》再版是很有意义的。

还想多说几句。1961—1964年，为编写高校文科教材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我有幸和严中平、李文治、汪敬虞、彭泽益、章有义诸师长以及聂宝璋、张国辉、姚贤镐、宓汝成、魏金玉、经君健诸学长在中共中央党校北院和南院之间的那两栋楼（今国际关系学院）中的北楼一块工作、生活了三年左右，真正是朝夕相处。严先生对我十分关心。这三年生活成了我珍贵的回忆。

2016年3月

再 版 说 明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参考资料。《丛刊》包括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工业史料、农业史料、手工业史料、对外贸易史料、外债史料、铁路史料和航运史料，凡八种。《丛刊》当年由科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研究者集齐这套资料实属不易。为方便资料的查找，在征得作者本人或家属同意后，现将《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八种，二十六册）进行再版，以飨读者。值得一提的是，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虽然初版时未冠以《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之名，但考虑到其为《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续篇，为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再版时予以收入。严中平撰写的《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附于《丛刊》第一种《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书后，供读者参考之用。《丛刊》首出于六十年前，本身已是史料的一部分。再版时为了不增新讹、便利研究者对史料的稽核以及研究者对这套史料的急需，采取了对部分（十九册）以繁体字为主的资料进行影印的方式，望读者明鉴。

《丛刊》收集资料范围广泛庞杂，既有中外文报刊、档案、笔记、函牍、奏章、条例、外交件等多种形式，又涉及英文、日文、俄文等多种文字。这些资料形成的时代也不相同，前后延续百余年。因此，《丛刊》部分章节在机构名、外国地名、人名等的翻译和数字使用诸方面与现行规范不尽相同，再版时为保留历史原貌，未做统一修改。另外，《丛刊》辑录资料或有当事人较多历史局限性的观点，均不另加注释。

《丛刊》再版过程中，无论是影印的部分，还是重新录排的部分，多有印迹不清、标点讹误，甚至辞意矛盾之处。编辑已竭力做了若干校对、修复与勘误，但限于水平，仍不免有疏漏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以便修订之用。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二辑1895—1914》依据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影印。

2016年3月

序

1895—1914 年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時期。中國的近代工業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標誌。中國近代工業在這個時期的發展及其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特點，能具體地描繪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時期的時代特徵。

中國近代工業在這 20 年當中是怎樣發展和變動的？它表現了一些什麼樣的特點？我們在這裏根據本書所收輯的材料。作一些初步的說明。

總的說來，這 20 年中國工業發展的情況是：在資本主義列強進一步破壞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國內市場繼續擴大的條件下，民族工業在整個 20 年中，特別是在從 1905 年開始的收回利權運動時期，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和民族工業同時並存並且妨礙民族工業發展的外國在華工業和清政府的所謂官辦工業，在這 20 年中，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外國在華的工業投資，在這 20 年中有了飛躍的擴展，這個時候的中國，除了當作外國商品的宣洩市場以外，又進而淪為幾個國家的資本激烈競爭的場所。民族工業在市場和資本上，承受着雙重的壓迫。來自帝國主義方面的壓力，這是民族工業發展之受到阻礙的一個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國內封建政府對民族工業的關係，則是雙重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在維新運動之後，曾經採取了一些獎勵工商業的措施，並且把原來的一些官辦工業招商承辦，表面上似乎

是要由上而下來推動民族工業的發展。但是實際上，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清政府，只會優待外國在華工業、而不能在經濟上（如資金、運輸和捐稅等方面）給民族工業創造發展條件。有之，則是和封建政府比較接近的工業資本家的上層，享受到比較特殊的待遇（如專利等），使一部分人得以更方便地利用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排斥中小資本家的發展和自由競爭。整個民族工業的發展則受到了很大的阻礙。至於所謂官辦工業的招商承辦，則不過是這些企業在封建大官僚手中，已經無利可圖，甚至成爲沉重的負擔，在“有利者留、無利者去”的原則下，推給商人去收拾罷了。真正有利可圖的企業，則往往禁止商人染指，當然更談不上鼓勵民族工業了。

面臨着國內市場的繼續擴大而同時又受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壓迫的民族工業，它的發展，不但是緩慢的，而且是迂迴曲折的。表現在：上層的資本家，得到一些發展，中小資本家，則得不到發展；有一個時期，出現了短期的繁榮，另外一個時期，則表現普遍的蕭條；在這一個場合下，資本家依附封建勢力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另外一個場合下，則又回過頭來依附帝國主義以反對封建政府的箝制。在各帝國主義者之間，則往往是或者依附一個帝國主義者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者，或者利用他們之間火併的空隙，以圖短暫的喘息和發展的機會。民族工業和國內外反動勢力存在着複雜的矛盾，同時又保持了血肉的聯系。

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國發展了它自己的對立物：不但發展了和它對立的民族資本，同時也發展了直接反對它的中國工人階級。在資格和年齡上都超過了資產階級的中國工人階級，在這 20 年中，隨着帝國主義在華工業的大量擴充和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得到了迅

速成長的機會。中國工人階級被剝削奴役的悲慘狀況及其反抗鬥爭的堅決態度，在它的成長初期，就已經很鮮明地表現出來。

以下我們就大體上按照這樣一個次序，作一些輪廓性的敘述。

—

首先，我們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工業投資的情況。

這 20 年中，帝國主義在華工業的擴張，我們可以先從兩個總的比較中，得到一些概念。第一是拿這 20 年的投資情況和 1895 年以前的投資情況來加以比較。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取得設廠權，雖然是由 1895 年的馬關條約正式確定的，但是外國在中國設廠的事實，在 1895 年以前，就早已出現。在 19 世紀的 40 年代，廣州、寧波、上海這幾個最早通商的口岸，就已經出現了小型的外國工廠。雖然在那個時候，大部份工廠是為商品輸出（如修理船舶）和原料榨取（如磚茶製造與繅絲）乃至文化侵略（如印刷）服務的，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帶有以資本輸出為目的的性質。然而，比起 1895 年以後的 20 年來，我們一眼就能看出，只有在這個時候，資本輸出，才成為列強對華經濟侵略的時代特徵。本書第一頁的統計，就明顯地擺出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 1895—1913 年不足 20 年中，資本在十萬元以上的外國大型工廠創辦時的投資，共為一億零三百多萬元，差不多超過了前此五十餘年的投資的 13 倍。這樣大的一個變化，自然不單純是一個量的變化，而是包含着巨大的質的改變在內的。

其次，我們再拿同期中國民族工業的投資額來加以比較。在本書第三章中，我們就歷年設立的資本一萬元以上的中國大小工廠作

了一個初步統計⁽¹⁾，根據這個統計，把其中資本額在十萬元以上的挑出來加以計算，它們在創辦時的資本，一共是一億零七百萬元，與上述同期外國工廠的投資約略相等。這個比較，必須聯系到下面這樣一個事實，才能得出全面的意義。這就是：上面的投資數字，都是設廠時第一次投下的資本，工廠成立以後的擴充、縮小以至停閉，都不能在我們的統計上得到反映。而實際的事實是：外國的大企業成立以後，擴充得非常迅速，我們在本書第 37 頁上可以看到，七個較大的外國煤礦在 1899—1913 年的 15 年間，投資擴充了 40 倍，這就是一個證明。相反，中國工廠成立以後，能夠順利發展的，只是極少數，多數則陷於停滯窘困的境地。中國紗廠是發展比較順利的一個工業部門，它在這 20 年中，曾經有過兩度高潮，但是，在本期設立的 19 家紗廠中，祇有南通大生紗廠等少數幾家，能夠繼續擴機增資，其餘大多數則莫不失敗易主，以致改組、出租、出賣的情況，已經發現的，就有 29 起之多⁽²⁾。紗廠如此，其他工業的情況，可以想像得之。所以我們雖然得不到這 20 年中中外工廠、礦場的實際投資數字，但民族資本之處於劣勢地位，則是無可懷疑的事實。這是 1895—1914 年 20 年間帝國主義工業投資擴張的總的情況。

正如水銀瀉地一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業投資，是無孔不入的。從重工業的機器、造船到輕工業的紡紗，從投資巨萬的礦冶工業到手工製造樟腦工場，都無一不滲透了外國的資本。但是在這樣全面進攻的局勢之下，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來他們的投資重點的。在這 20 年中，礦冶、造船、紡紗、煙草和公用事業中的水、電、氣工業這五個

(1) 本書第三章，附錄一，歷年設立的廠礦名錄。

(2) 參閱本書第三章，並參閱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頁 143。

工業部門的投資，差不多佔了全部投資的 91.2%⁽¹⁾。正是在這幾個主要的工業部門中，表現了本期帝國主義對華工業投資的一般特點，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分析。

第一是在這 20 年中，帝國主義在華的工業投資，已經形成了中國工業上的壟斷力量。大家都知道，外國在中國的幾個大的工業壟斷組織，都是在這個時期內形成的。煤礦工業中的開灤、福公司、撫順、本溪湖、山東德華、井陘、臨城七大煤礦在 1913 年的產量就超過了六百萬噸，單是開灤、撫順兩礦就各佔二百多萬噸，而當時全國煤產量，却不過七百六十多萬噸⁽²⁾。機器造船業中的耶松船廠，在 1900 年合併了上海的另外兩個船廠以後，資本由七十五萬兩增加到五百五十七萬兩⁽³⁾，壟斷了當時上海的整個造船工業。1902 年成立的英美煙公司，在成立以後的十年中，工廠由一個擴充到四個，工人由百餘人擴充到近萬名，資本由十萬〇五千元擴充到一千一百萬元，超過了當時中國所有煙廠資本的 7 倍⁽⁴⁾。水、電氣工業中，英國資本的上海煤氣公司，在 20 年中，資本增加了 5 倍，變成了“製造煤氣比歐洲和美洲以外的任何英國煤氣公司都要多”的龐大托辣斯⁽⁵⁾。紡紗工業中，英、美、德三國一口氣在 1897 年成立了四個紗廠，加上後起的日本上海紡和內外棉，差不多佔了中國棉紡織業的半個天下。帝

(1) 本書，頁 3；均指設廠時的投資。

(2) 本書，頁 38；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頁 124。

(3) 本書，頁 236；孫毓棠：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頁 13。

(4) 本書，頁 23，208，216，399；愛蘭等：遠東經濟發展中的外國企業，頁 169。

(5) 本書，頁 22，268。

國主義的托辣斯組織，不但壟斷了工業的一個單一部門，而且往往壟斷了工業中的幾個部門乃至國民經濟中的許多部門。這個時期中形成的兩個最大的壟斷組織——英國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就是壟斷了很多經濟部門的大托辣斯。怡和洋行投資的範圍，從保險、地產、輪船、碼頭以至電車、鐵道，在工業中，則不僅是紡紗，而且包括了繅絲、打包、木材、電燈、製糖、製冰、冷藏。從 1832 年怡和洋行成立之日起，到 1914 年止，先後成立的企業，就有 30 個單位，資本至少在四千萬元以上⁽¹⁾。抱着獨佔東北的野心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則是一個以投資鐵道為主的大托辣斯。這個公司在 1906 年創辦的時候，額定的資本即為兩億元，1920 年一躍而為四億四千萬元，“如此巨大的資本，以三井公司或三菱公司之財產，或足與之比較，但僅一公司而有如此巨大資本者，在日本固無之，即以財力充實之正金銀行論，……亦僅及滿鐵資本之半數耳。由此觀之，滿鐵不僅在日本公司之中，高據王者地位，……即在世界擁有如是鉅資者，亦寥寥可數。”⁽²⁾

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下的中國，各帝國主義大資本的壟斷與各國在華勢力範圍的搶佔，就有不可分的聯系。這在採礦工業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我們從本書第一章第二節所列舉的劃定和壟斷礦產的條約、合同和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礦區的割據與爭奪中，就看得很清楚。具體的情形，不在這裏重複敘述。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礦區的割據，多半是以軍事和政治力量作後盾，取得了條約上的保證，經濟侵略和軍事、政治上的侵略是密切結合起來的。在中國的領

(1) 本書，頁 330—331。

(2) 本書，頁 341—342。譯文經編者略加更改。

土上第一個被帝國主義掠取的大礦——山東德華煤礦，就是由兩個傳教士的被害，在德國的大炮口底下被強佔去的。“這樣一種行動，在國際禮節上，是史無前例的。它甚至破壞了國際道德中最起碼的信條。它由此在基督教的教義和西方文明的名字上有意地留下了無法抹去的污點”⁽¹⁾。

在各帝國主義大資本的壟斷和勢力範圍的劃分底下，包含着最尖銳和最激烈的競爭。我們用不着提那些人所熟知的礦區的爭奪，在那裏，各帝國主義者對每一個礦區，都像爭食着一支骨頭的幾隻餓犬。在製造工業裏面，競爭激烈的程度，也是不減於礦區的爭奪的。英美煙公司在瀋陽設立了工廠和推銷機構以後，日本立刻成立了東亞煙草株式會社，“對英美煙公司展開了猛烈的競爭。”這種競爭，日本人自己稱之為“其他任何地方看不到的激烈的煙草戰。”⁽²⁾ 機器造船業中的大托辣斯耶松船廠，在1900年合併了上海兩大船廠——祥生和豐——以後，剛剛慶幸他們自己從此“可以免於粗暴的競爭，”⁽³⁾却又碰上新的對手——萬隆、瑞鎔等船廠。他們的股東在1906年就這樣說：“現在興起了一批企業，並且能夠賺錢，它們都是我們的對手。”這就使得“他們[指耶松]的生意，並不是隨時都順手的，他們須付出大量的精力，兜攬生意。如果對手們削價競爭，他們也須還之以削價競爭。……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在價格上可以比他們的對手降低5%，如果有必要，就讓他們終年賠本不要一文股息吧。……他們最

(1) 本書，頁52。

(2) 本書，頁235。

(3) 本書，頁239。

後還是會勝利的。”⁽¹⁾還有什麼比這些激動的言辭更能體現出競爭的激烈麼？

同樣“削價競爭”的情形，就是在劃分了勢力範圍的煤礦業中，也會經常地出現。在英國資本的開平和日本資本的撫順之間的情況，就是這樣。從撫順煤礦大規模的生產開始以後，在華北的市場上，撫順煤和開平煤就開始進行了激烈的競爭。1911年，“撫順煤的價格，每噸已經由12元減至10元，而它的競爭者則正以9元出賣。”⁽²⁾可見，壟斷是不能消滅競爭的，競爭產生壟斷，但壟斷又一再地產生競爭；壟斷消滅了自由競爭，但同時它又為最殘酷的和不斷的競爭創造了條件。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工業投資的競爭，有力地證明了列寧的這個真理。

當然，尖銳的競爭，並不排斥暫時的聯合和妥協。大煙草托辣斯英美煙公司就曾經這樣宣稱：“英美煙公司實一萬國公司，”“蓋兩國製造家，知同行為敵必至兩敗而俱傷，不若通力合作，成一偉大製造家之為愈。”⁽³⁾但是這種口頭上的宣言，並沒有改變這個托辣斯最後全部入於英國掌握的事實。暫時的聯合，不說明別的，它只說明“互相傾軋”的尖銳化。我們在本書第185頁看到德國資本參加了英國紗廠等的投資，但是接着我們又看到俄國道勝銀行扼死英國協隆紗廠的事實。讀者看了這條材料，難道就真的相信道勝銀行之扼死協隆紗廠，就如協隆的費龍先生所說的那樣，只是由於道勝銀行的總行不在上海而在聖彼得堡，因此“不應希望從遠在數千哩以外的一個銀行

(1) 本書，頁255。

(2) 本書，頁176。

(3) 英美煙公司在華事績紀略，頁5。